



# 清末学堂师长与辛亥革命

## ——以自强学堂为中心

左松涛

**摘要：**清末自强学堂(后为方言学堂)是辛亥革命胚胎地之一，相当数量的学生投身反清活动。晚清学堂师生虽因立场处境不同，代际有所冲突，但因势求变之心类似，行为看似相反，实则相成。比勘新旧史料，张之洞被称为“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”确有实事可证，钱恂更代表自强学堂师长辈中与反清活动有直接联系者。辛亥革命的多歧面相，从清季师生关系走向略可窥见。

**关键词：**张之洞；钱恂；自强学堂；辛亥革命；清末师生关系

辛亥革命发生迄今即将届满百年，国内外史学界对其研究已相当深入。以区区篇幅，只能略为提及前贤贡献，不免遗珠之憾<sup>①</sup>。1993 年编纂出版的《武汉大学校史》辟有专节，以近 20 页篇幅梳理武汉大学前身——自强、方言两学堂学生与辛亥革命的事实关联，详细叙述了革命酝酿阶段，自强、方言两学堂学生中几位声名突出者的事迹，有史称为被孙中山派入长江流域组织革命第一人的戢翼翬及刘成禺、马德润、冯特民等，也介绍了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(1900 年)、留学生最早的革命刊物《国民报》(1901 年)、中国人最早创办由国人自己翻译日文书的团体“译书汇编社”(1902 年)及科学补习所(1904 年)等社团组织；《校史》还叙述了在武昌首义前后校友聂豫、张育万、王文锦、熊一飞、贾汉铎等人浴血奋斗，乃至付出生命的史实<sup>②</sup>。

虽有学术成果蔚为大观，但仍留有有待讨论之处。学生反清活动多见着墨，却少有讨论师长辈的举动，甚至仅视其为压制革命的反动势力。若跳出将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理路，比勘新旧史料，在自强学堂师长辈中，张之洞被孙中山称为“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”确有史实可证，与反清活动有直接联系者，钱恂是典型代表。他们对学生投向革命阵营，都有客观促进作用。

### 一、张之洞宽容反清

张之洞是清末重臣，自诩心术大中至正，死后被朝廷公开表彰。1909 年 10 月 4 日，上谕赐谥“文襄”，赞许“公忠体国，廉正无私”。庚子年“顾全大局，保障东南，厥功至伟”<sup>③</sup>。革命

①台北学者苏云峰的《清季武昌学界的革命运动》(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 4 期上册，1973 年)是较早注意到武昌学堂学生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论文。贺觉非、冯天瑜著《辛亥武昌首义史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)则是了解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史事的重要著作。2011 年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天瑜、张笃勤著《辛亥首义史》，订正更多前讹。

②吴贻谷：《武汉大学校史，1893—1993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，第 41—57 页。

③吴剑杰：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下卷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，第 1028 页。

党视其为清廷家奴,呼之为“老贼”,“罪大恶极,人所共愤”,为其死拍手称快<sup>①</sup>。两厢对照,张之洞镇压革命似乎至死方休。一般认为,张之洞治鄂所开创的各种事业,为后来武昌首义积累物质与思想准备,被职业革命家誉为“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”,是从逻辑推衍角度理解,并非真有相关事实。近有学者撰文挑战固有观念,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,张之洞有“独立称王”之念。此论引发高度关注,后续讨论余波未断<sup>②</sup>。张之洞是否有“帝王梦”,暂不深论,但据已揭新旧史料比勘对读,似可证实:庚子年前后,张之洞等宽容门下弟子反清,甚至早就洞悉其人心机,却隐忍不发,事后亦不检举惩处,可谓纵容。

首先,张之洞颁示学堂管理章程有防范学生异动考虑,但形同具文,甚至确有“劣迹”者仍受师长赏识。从章程文本考察,当局严格甄选学生,讲究其身家关系。1897年,自强学堂改章招考,学生“必须资性颖悟,身家清白,先通华文,先读儒书,义理明通,志趣端正,方能与选。”具体对象是“各省举贡生监职员官绅子弟”,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。章程明确管束学生责任,“凡在诵堂,听华洋教习约束;凡在斋舍或饭厅,听提调总稽察并管学委员约束。如有犯规者,在诵堂即由教习酌量儆戒,在斋舍由提调酌量儆戒,不率教者斥退”<sup>③</sup>。这当是鉴于自强学堂学生多不服从管理,教习又对学生行为推波助澜,有为而发。1896年4月,学堂总稽察姚锡光注意到前任提调盛春颐早有辞去之意,“唯恐不速”。因为“本堂学生(即方言斋住堂学生二十名)人类之杂,教习把持,本堂提调委员不能管束学生,一经管束,学生遂聚众鼓噪”<sup>④</sup>。为改变学生来源结构,张之洞屡颁高标准要求,但却不能落实。1899年7月,张之洞咨文湖北学政选派实年20岁以下“身列胶庠深通文理者”入堂读书。后又强调“其职监及并无功名各色人等,以及实年逾十八岁者概不收入”。用意是“目前则流品行检易于考察,日后则科名进取易登仕途,可备国家任用。”然而执行效果不佳,一年后学堂“阙额尚多”。张之洞只好行札各属“再从宽调取”,年龄放宽至20岁,学生是生员与否后也不了了之。官府一再重申对学生稽查整顿,实际效果并不理想。1901年,张之洞委派候补知府连捷为自强学堂总稽察,规定其“务须常川住院,并须率同教习委员等,均在饭厅吃饭,随时随事,认真稽查,倘有桀骜悖妄之学生,不守官法,不遵师教,不服该守劝戒者,即据实禀知总办,告知提调,并禀明本部堂,立予开除,分别惩儆。”巨细靡遗的规定是之前学堂管理松懈、学生思想日趋激烈之明证。但是,所谓“禀明本部堂,立予开除,分别惩儆”却是空言而已。1898年,自强学堂学生刘问尧(刘成禺)、管存元等“酗酒滋事,纠众毁闹”,被“屏斥注劣,随时惩儆”<sup>⑤</sup>。实际刘成禺并未受损,继续得到关照。1900年,张之洞亲信、幕府文案张望杞致函郑孝胥“荐江夏刘生成禺,求为铁路附学生。刘生自投书述其所学,词气甚张”<sup>⑥</sup>。1906年,张之洞门生黄绍箕任湖北提学使,发现方言学堂学生“擅自出堂”(罢课),怀疑“有素不安分之人从中播煽”,虽然声明“嗣后务须加意约束,弗以姑息为爱”,但处理意见是“现姑格外从宽,著令出堂各生赶向本堂监学报明事由,入册存查,以年内为限,如违不报,定即开除,切勿俟延自误。”<sup>⑦</sup>

其次,张之洞本人宽容反清学生亦有确实证据。自强学堂学生不服从官派委员管理,与张之洞不无关系。慕僚陈庆年就认为“南皮师平日专主宽裕,委员承事者亦皆以相忍姑息,博得一时清静,即为深幸。”<sup>⑧</sup>孔祥吉注意到,张知悉武备学堂留日学生吴禄贞有十分露骨的革命反满思想,非但不深究,且在其学成之后,委以要职,为清廷埋下重大隐患。这是张之洞同情革命党人的铁证<sup>⑨</sup>。文章对张之洞“袒护”自强学堂学生沈翔云论说稍少,相关材料未辨析讨论,故可补述。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记沈翔云生平:

①精卫:《张之洞死》,载《民报》1910年第25号。

②孔祥吉撰《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——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》(《刊《学术月刊》2005年第8期)一文引发话题,李细珠著有《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——与孔祥吉先生商榷》(《刊《近代史研究》2010年第3期)进行辩驳,张之洞后人张遵遂、张厚琚也撰写《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的几个问题》(收入冯天瑜、陈锋主编《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另,除孔氏2005年文外,其余诸文俱收入本书)一文质疑。孔祥吉新撰有《为张之洞释梦——兼答李细珠诸先生》(《刊《近代史研究》2010年第5期)回答了相关疑问,坚持“帝王梦”之说。

③陈山榜:《张之洞教育文存》,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,第150、151页。

④姚锡光:《姚锡光江鄂日记(外二种)》,中华书局2010年,第88页。

⑤《张之洞教育文存》,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,第307、320、321、290页。

⑥《郑孝胥日记》(二),中华书局1993年,第754页。

⑦孙延钊:《孙延钊集》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,第329页。

⑧陈庆年:《戊戌己亥见闻录》,载《近代史资料》总81号,第123页。

⑨孔祥吉:《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——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》,载《福建论坛》2010年第5期。

沈云翔，字虬斋，浙江乌程县人。少有大志，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。己亥（1899年）鄂督张之洞遴选优秀学生派往日本留学，云翔预焉。时孙总理、陈少白、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，彼此往返，相与研究革命方略，至为透辟，云翔偕同学戢翼翬（元丞）、吴禄贞（绶卿）访之，一见如故，对总理尤倾倒备至<sup>①</sup>。

学者据黄兴书信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报告，已考订出沈翔云、黄兴等人实际赴日留学时间不在1899年，而是1900年5月12日由上海启程，同行者有张之洞之子张权等人<sup>②</sup>。留学团队人员有：监督，知府钱恂、知县委员徐元瀛；学生，长期学生马肇禔、卢定远、刘修鉴、姚恭寅、董鸿祯、沈翔云，短期学生陈问咸、李熙、卢弼、左孝全、尹集馨、黄轸（黄兴），另有哨官武备学生严寿民、艾忠琦、戴任<sup>③</sup>。

这就证明收入张之洞文集中名为《咨北学院将武备学堂藉端生事之学生朱建时等三名注劣》的公文时间顺序错乱，似是后来编造，试图掩人耳目。该咨文谓：

为咨明事。为照日前操练行军队，武备学生竟有与委员滋闹情事，操演之时亦有乱行嬉戏者，实属不遵军律，不敦士品。且查该学生等平日在堂，亦多有藉端生事者，查有方宾观、沈翔云、朱建时、黄显荣、黄瑞兰五人最不安静，均即行革除出堂<sup>④</sup>。

行咨日期为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，即1900年5月24日。揆诸事实，沈翔云早已抵达日本。咨文未提及如何处理沈翔云，最大可能性是沈为浙江人，不在湖北学政管辖范围。此时，撰文者对沈氏身在外国，难以论处，或心知肚明。后来被贴上危险分子标签的人，此时与堂堂总督大员张之洞寄予厚望的儿子同行同船千里之遥，应是当局尚未发现访日团队成员任何异常。

6月17日（五月十一日），张之洞已知沈翔云是“最不安分之生”，致电钱恂：

沈翔云系学堂最不安分之生，滋事荒谬，已牌示革除。此次虽自备资斧游学，断不可与鄂生同学，防其染习败群，须另派一堂为要。梁山长谆切言之，屡嘱鄙人阻止。速照办，并复鄂督署<sup>⑤</sup>。

张之洞的信息来源是梁鼎芬，梁向张已经多次揭发检举沈翔云。据说，梁氏早对张之洞容忍反清诡谋不满<sup>⑥</sup>。不过，即使对沈的“劣迹”了然于心，张之洞仍宽宏大量，仅要求“另派一堂”而已。

9月，张之洞镇压唐才常起事，逮捕傅慈祥，搜出往来文书。他发现学生串通“谋逆”，确知留日学生中有异，急电钱恂小心防范，敦促张权返国。张之洞撰《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》痛斥参与者剿袭康梁唾余，不念朝廷恩典、官师教化，反噬倒戈，并以犹太人亡国悲惨历史为鉴，提示盲从康梁将导致中华覆亡。尽管如此，张之洞犹网开一面，宣布将只办为首，不问胁从：“今日除康梁二人外，其康党曾与诡谋，而逆迹尚未昭著者，果能憬悟改行，勿作非，勿惑众，官司亦不自株连穷治……即使曾经随同滋事，现在刊单逮捕之列者，若早能诣官首悔，尚可许其湔洗自新。”<sup>⑦</sup>11月8日，张之洞致函驻日公使李盛铎信，坦承对学生温和对待之心迹：“然弟于此曹少年文士未尝不深悯而痛惜之，因于百忙中特草劝戒国会文一通，冀有以平其矜心，发其深省。多一人省悟，即少一人附和，亦即少一人株连，或亦伐谋之一助。”<sup>⑧</sup>

①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上册，新星出版社2009年，第68页。史料中将“沈翔云”写作“沈云翔”为表述习惯，不是讹误。

②萧致治较早考订出黄兴首次离开武汉赴日在1900年4月15日以后。见氏著《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》，载《历史研究》1999年第1期。

③孔祥吉：《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——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》。李细珠从河北版《张之洞全集》发现《札北善后局垫发选派各员生赴日本游历游学费用附单》文件，查得沈翔云、姚恭寅、董鸿祯三人不在湖北官府资助费用的名单之列。按，沈、董是浙江人，得不到湖北官费理所应当。

④《张之洞教育文存》，第306页。

⑤《张之洞电稿乙编》第12函，所藏档甲182—73。转引自李细珠：《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》。

⑥孔祥吉《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》、《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》两文均引述黄潜《花随人圣庵摭忆·补编》所载梁鼎芬致张之洞函，证明张对自立军的模棱两可立场，从而认为张对清廷不忠，且有“非分之想”。该笈主要内容是指责张之洞对“贼”容忍，言其“顾忌游移，心慈手软，但切隐忧于私室，不能昌论于公廷，徘徊一月，缠绵千语，计尚未定，贼已渡河”。之前学者质疑孔文是说，但似未论说完全。兹将多处疑问谨述如下，就教高明：其一，信函出自戴亮吉私人所藏，是来源不明；其二，据见过原件的黄潜说是“凡四纸，笔意飞速”，字迹较难辨识，黄氏即称“此书月日草书似作四月”。梁鼎芬对上司作如此潦草之信，所谈内容又如此重要，亦有可能之疑；其三，正因为可疑，黄潜对如何理解信函“久未能决”，请教赵凤昌“亦莫能定”；其四，最为重要的是，若该函并非伪造，且所署日期不误，则不可能是庚子年之信。信件末写明“鼎芬顿首，四月三十日”，然查庚子年四月乃是小月，只有二十九日，并无所谓的“四月三十日”。总之，所谓梁鼎芬致张之洞函，仅是可疑孤证，虽助论说，亦暂不取。

⑦杜近之：《自立会史料集》，岳麓书社1983年，第173页。

⑧吴剑杰：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下卷，第656页。

官师已示好意,学生却不领情。沈翔云为首,章仲和、戢翼翬等人参与,撰文反驳张之洞,文章也以外国历史知识相辩,对张之洞嘲讽颇多,不乏刻薄之语,师生情谊荡然无存。12月29日,张之洞在愤恨之余,决定惩处昔日学生。他与日本交涉,要求将为首留学生驱除回国。沈翔云、吴禄贞被视为“万万不可教训,应请日本学校查明即行斥除”,沈翔云罪状是“凡乱谋悖论,皆该生所倡首,尤为险谲之徒”<sup>①</sup>。不过,张之洞的意图并没有实现,而被钱恂秘密化解(后详)。

张之洞如何处理反清学生,实有尴尬。一方面,确实证据已经掌握,不得不对学生加以惩办;但若大面积追究,这些学生与自己及亲信幕僚多有联系,牵扯太多,就会伤及自身,予政敌以口实。身在海外的康有为攻击张之洞,即撰文揭发被处死“乱党”与他多有师生之谊,且涉及亲信、姻亲关系。“而蔡邕者,则张之洞心腹之蔡观察毅若之胞侄也。林锡奎者,则张之洞侄婿之胞兄,而亲家林观察之子也。傅慈祥者,武昌亲养之武备学生也。”傅曾与张之洞共饭<sup>②</sup>。权衡之下,张之洞对未得确证于己不利者手下留情。他原本意图将湖北留日学生尽数调回,最后却对外宣称没有此意,“学生助乱者甚多,皆予以自新。逆迹尤著者三人只不送入学校,不代出学费,声明此三人将来善恶成败不与湖北相涉耳,可谓极宽矣。”<sup>③</sup>沈翔云后来经历,大体可证张之洞所说不诬。沈氏在革命同时,亦结交清廷高官,通过两广总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关系,参与粤省新政事务;又通过熊希龄,想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做事。若张之洞穷追不舍,这些俱不可能。辛亥革命后,沈翔云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外务科长,在此位置贾祸,被杀身死。

1900年9月局势明朗之前,张之洞一直暗中谋划应变,某些准备超越朝廷官员本分,成为非常之举。这可能是他明知武昌及留日学生中反清活动频繁,却隐忍不发的重要原因。是年7月中旬,日本驻沙市领事二口美久致外务省报告:

张之洞就北京骚乱事召集同志秘密会议。本地道台应电召,于本月三日向武汉出发。道台今晨未明时分还归沙市,直接来访,告知会议始末概要。此次召集同志为张之洞所信任之员,有荆州江陵知县候补道朱滋泽、本地道台夔良及张幕府各员,密议事项为针对时局之措置办法及善后策。最极端之意不外两点:一、打倒现政府,组织纯然由汉人领导的新政府;二、联合同志实行中央支那独立计划。目前北京政府之真意及京畿实况尚不明朗。张之洞说,现政府执政者先不必言,李鸿章、王之春一意依托俄国,袁世凯表里不一,李秉衡则思想顽迷专意排外,此等附和政府之人尚多。必须制定最为慎重周密的计划,故稍待时局变化,再行会议决定<sup>④</sup>。

可见,正是要实行所谓“中央支那独立”,张之洞内心视“附和政府之人”为潜在对手,而那些早就对清廷有异心的学生却可能是待“联合”的“同志”。

## 二、钱恂有意反清

张之洞事实上宽容反清学生,是周围各种条件合力的结果。其核心幕僚、自强学堂提调钱恂与反清活动更有直接关联。

钱恂号念劬,1854年生,浙江归安人,以通西学、晓西事著称。1895年,入张之洞幕府,为洋务文案,兼差办理多种新政事务。甲午战后,湖北与日本关系日趋密切,钱恂为张之洞出谋划策。张对他评价颇高,称“学识淹雅,才思精详”、“所见近日通晓洋务之员,其密实知要,未有能过之者”、“恂为今日讲求洋务最为出色有用之才”<sup>⑤</sup>,两次向朝廷举荐任用。钱恂沟通朝野中外,与顽固、革政、革命及外国在华势力等各派别周旋活动,具有多重面相人格,思行志业难以一言蔽之。与钱家关系匪浅的周作人写有《钱念劬》一文,勾勒其人轮廓,兹引述重要部分:

他是清末的外交官,曾任驻日参赞,驻罗马公使,可是并非遗老,乃是所谓老新党,赞同改

①孔祥吉:《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——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》。

②《康有为全集》第5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,第284、304页。

③吴剑杰: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下卷,第674页。张之洞有意撤回留学生,可见钱恂致汪康年书(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三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,第3009页)。

④戴海斌:《“题外作文、度外举事”与“借资鄂帅”背后: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正》,载《近代史研究》2011年第2期。

⑤《张之洞全集》第2册,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,第1119、1317页。

革,略有排满的气味,可以算是一个怪人。他年满七十之后,常穿一双红鞋,乡学年世谊的后辈称之曰红履公,或者此名起于他介弟玄同亦未可知。他家中有一名使女,名字读音如鸿烈,这不是用的《淮南子》典故,因为他最恨清乾隆帝弘历,所以以此为名<sup>①</sup>。

钱恂是张之洞心腹,传声代言,章太炎比喻两人有如《石头记》中的王凤姐与平儿<sup>②</sup>。王以能干著称,实际得力平儿不少,后者是“总钥匙”,常出主意。在刘姥姥看来,“便当是凤姐了”。但既是丫鬟,总不免受主子的气,可平儿不仅有才干,也是贾琏“通房丫头”,敢跟太太翻脸。这一比喻精当。1900年下半年,顽固势力如北风过境,沉滓泛起。钱恂认为湖北政治渐趋保守,痛惜“往岁声名坏于一举”。张之洞深恐钱氏言论放肆,牵连到己,有意疏远,但又游移不决,钱恂自言“然又不敢竟许我辞”,“去电婉而坚,南皮竟不敢复。南皮颇后悔,曾来一电,几自认错”<sup>③</sup>。不过最后,钱恂仍弃张而去。

钱恂有一定的民主思想,也有“排满”意图。他自认为在湖北期间,“颇有功于开官智”。钱恂乡试屡试不第,对死读儒家经典、无治事经验的朝廷官员嗤之以鼻:“凡进士出身者,十人中有二人明白,已为国家大幸。”钱恂所开“官智”既有器物技术层面知识,也涉及思想意识形态范畴。他不满汪康年将“此书谬极”的《德国军制》购送张之洞,批评汪所办报刊译文“文话太多,大失西文本意,亟宜痛戒,不然,即蹈蔡尔康之弊。要知西文不解中国词头也,如十报谏俄皇书,全用中国下腴上字面,如圣躬、如宸衷、如天威、如陈奏、如普天同庆、如贡物、如祝嘏,种种可恶字面,愚不取也”。他对清季政以贿成、顽固官僚把持大局极为不满,私下将军机大臣鹿传霖、荣禄等均称之为“贼”,毫不念及鹿乃恩主张之洞儿女亲家,甚至将为顽固官员开脱责任的上谕直呼为“狗屁大话”。钱恂愤激之下,不免有极端之论,认为“今中国人声声言白种必奴隶黄种,几几有不甘奴隶之心。然试问,我中国人以前能自伸黄种之权乎?以前既甘为奴隶,以后何必不甘?窃恐白种究胜满洲也”<sup>④</sup>。由于思想超前,钱氏不仅遭到保守官员仇视,连同样趋新的郑孝胥也有所不满。1898年,钱恂认为“中国决必分裂,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,为日本臣妾,此大幸也。”郑孝胥注意到“有湖南京官闻之,甚愤,告孝胥曰:‘再见,必批其颊!’”郑也认为“钱之不检若此”,告诫张之洞要“慎听其言”。张之洞反应是“颇栗然,曰:‘此何等语,钱守乃妄发耶!’”<sup>⑤</sup>不过,钱恂仍特立独行,我行我素。1900年10月1日,张之洞致电钱氏,令其悬崖勒马:

闻阁下在东与诸生言因持论喜通达时势者,诸生不免误会,失其宗旨。近来诸生行止议论多有悖谬,于是此间众论多归咎于阁下。傅慈祥临刑大言曰,我为钱监督所误。又闻阁下致善后局信函面写“南清湖北省”字样,见者骇然,群议大哗,并归咎于鄙人。务望格外谨慎,勿为好奇之谈,勿为愤激之语,以免流弊。万一被人指摘,阁下固受其累,且从此出洋学生之路绝矣。千万采纳<sup>⑥</sup>。

电文是两人分道的导火线。由此可知,钱恂办理学堂、监督留学生时,栽培与己气味相投的学生,会将新颖思想观念灌输给学生。在他看来,“学堂多事,乃文明渐渐进步之效,看似棘手,其实于社会上大有益也。”<sup>⑦</sup>学生耳濡目染,反清程度进而超越师辈,立即付诸实行。

钱恂对立场保守的教习心有不满,却对门下弟子颇多关照。在他看来,辜鸿铭“荒谬绝伦”,“其人英文果佳,然太不知中国文,太不知中国理,又太不知教学生法,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。何用哉?”欲图排挤辜,“能不再来学堂,则大妙耳”。他对学生观感本来不佳,“宁静固未易造,雄迈亦不敢许,夫以二千年未蒙教化之种子,二三十年(学生多二十以外,湖北有一学生,直隶南皮人,年五十余矣)未闻教化之原料(原料是恭维语,实言之曰废物,曰腐质)仅仅教之一年,以云有用,岂不远甚。”不过,“眼光放大,知并此不教,中国更无种子。故不惮逾分千万分以奖励之耳。”当沈翔云等将被驱除回国,钱恂暗中保护,致信

①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第10册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,第846页。

②孙宝暄:《忘山庐日记》上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,第372页。

③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(三),第3009、3010页

④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(三),第2997、2998、3012页

⑤《郑孝胥日记》(二),第703页。

⑥吴剑杰: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下卷,第651页。

⑦钱恂还自谓:“无论何地之学生,必俟恂一抚视始镇静,盖别有妙术。”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(三),第3016页。

汪康年:“湖北公牍欲撤归两学生,彼(笔者注:日本)政府取决于弟,弟一定断为不可,彼即照办此事。上海有所闻者,祈密之。”<sup>①</sup>

更可注意的是,前述1900年湖北赴日名单中有“董鸿祚”一名,他与钱恂关系重大,更能坐实钱与反清革命的关系。之前学者认为此人“情况不明,待考”。实际上,“董鸿祚”应写作为“董鸿祚”,他是钱恂次女婿。董字恂士,浙江仁和人。1897年,从钱在鄂学习。1900年,董鸿祚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,成为激进分子。据与董有交往的冯自由记载,1902年冬天,董鸿祚等人鉴于励志会已腐败变质,改而组织结成“青年会”,寓意少年中国,会章以“民族主义为宗旨,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”。发起人还有叶澜、张继、汪荣宝、苏曼殊、冯自由、金邦平等二十余人。冯自由认为该组织是“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”<sup>②</sup>。1903年,董鸿祚参与拒俄运动,发起创办《浙江潮》杂志,又组织“军国民教育会”,以“鼓吹、起义、暗杀”三者为手段,并秘密与孙中山交往。董鸿祚在日本这些反清革命活动,钱恂应当知情。辛亥革命后,钱氏翁婿经历亦可溯知早有“异心”。1912年,董鸿祚是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,后为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,代理总长。钱恂任职教育部,1913年应征创制中华民国国歌。

## 结 语

以趋新为进步、以变化为进化的观念在晚清已经大行其道。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以人之代际对立譬喻为国家强弱分际,将积贫归因“老朽之冤业也”,将建设中国责任寄予“少年”,“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富则国富,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独立则国独立……”的文句直到当下仍脍炙人口,影响既深且远。这使得后人多注意年轻一辈的反清革命活动,对已届中年以上的学堂师长类似举止关注不够。清末为宣传变革而作的文论,仅是时人对时事的看法或造势,并非客观历史真相,更不能成为认识历史前提。因此,在注意“学生运动”同时,也应考察“师长运动”,若割裂来看,所谓学生运动史必然流于简单片面。

清末新式学堂兴办之初,规模相当简单,人数十分有限,但教读其中者均非普通之辈。师生之间、教习之间、学生之间、学堂与官府机构之间存在种种社会关系上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种关系网不到非常之时,万不得已的情形之下,不会轻易打破,兵戎相见。自强学堂的历史说明,清末学堂师生都具有因应时局之变的考虑,而在求变与革命之间,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,行为看似相反,实则相成。

例如,因师生立场处境不同,各有盘算,不免冲突突变。学生唐才常胁迫张之洞起兵“勤王”不成,欲图动手“犯上”,反被乃师先发制人。但在革新变政问题上,朝廷中刚毅等昧于局势之人,煽动民变以应对外国势力之事,却是师生有效的黏合剂。总之,辛亥革命前十余年即已开始的这段因缘,实为启发后来诸多大事之枢纽。对于1911年武昌首义前已一命呜呼了的张之洞和在浙江老家做绅士的钱恂,应与他们那些青史留名的学生一样,算是出过力气之人。

●作者简介:左松涛,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;湖北 武汉 430072。

●基金项目: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(09CZS016);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(2010026);武汉大学“70后”学者学术团队建设计划项目

●责任编辑:桂 莉

①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(三),第2997、3013、3010页。沈翔云是浙江乌程人,与钱恂是同乡。

②冯自由:《革命逸史》上册,第83页。